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选编

北京文史资料精华

文苑撷英

WENYUAN XIEYING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文史资料精华》编委会

主 任：舒 乙

副主任：弥松颐 贾凯林 陶信成

委 员：王灿炽 李 甦 李滨声

张 洁 陈平原 郑 潜

赵其昌 谢 方 蔡美彪

戴 贤 张秋萍 杨良志

本卷执行编委：弥松颐

选编说明

《北京文史资料精华》是从本会近二十年来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中精选而成，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文化科技、教育医卫、工商经济、社会生活、文学艺术、名胜园林等诸方面，分为《世纪风云》、《杏坛忆旧》、《文苑撷英》、《风俗趣谈》、《商海沉浮》、《梨园往事》、《府园名址》、《艺林沧桑》八卷，共约 350 万字。

这套丛书主要收录北京地区的史料，上起 1898 年戊戌变法，下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个别篇目有所突破。入选篇目以历史当事人或见证人亲历、亲见、亲闻的回忆录为主，也有少量是通过采访调查整理而成的。丛书未收中共党史资料，以体现同党史部门的分工与区别；但是有关统一战线和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的史料，在个别篇目中也略有涉及。

这套丛书属于文史资料的分类汇编，是根据已有史料的实际情况进行遴选的，难免有或轻或重、某些卷的内容不单一、书名不能完全涵盖全卷内容等情况。编辑时，除订正个别技术性的错误以外，对文字一般不做大的改动；原则上不重新考订史实，只对已经发现的明显错误进行纠正。由于篇幅所限，有的篇目收入时作了一些删节和摘选。重新厘定了部分文章的标题。由本市各区县政协和民主党派、工商联提供的稿件，书中不一一注明。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9 年 8 月

序

舒 乙

我曾说过：“文史资料”类书籍属于我最爱看的图书行列。
我至今还这么看，这么想。

而且，我愿意向广大读者做这样的推荐。

我还要补充一句：“文史资料”类书籍也是最好看的书籍。
这么说，并无夸张之意。

世界上的事，常常是很奇怪的。它产生的初衷，并不和后来的结果相吻合。“文史资料”便是这种奇怪事物之一。

周恩来总理是“文史资料”这个事情的首创人，从这个角度讲，他是个发明者。因为，历史上没有过，外国没有过，本国也没有过。实属首创。

常说：某件事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

“文史资料”当属于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事物之一。而且是很辉煌的一个。

周恩来总理四十年前倡导编纂“文史资料”时，并不是为了好看，他是为了存史。他让那些经历过历史上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将自己“亲身经历、亲见、亲闻”的事如实地记载下来，不怕细小，不必成系统，也不必加评价和分析，只是存真，作为正史的参考和补充。

这个思想，后来，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首先，它成了一个事业，很大很大的事业。周总理把这事

分给了政协办。政协有全国的，有省市的，有区县的，下面都有搞文史资料的专门队伍，总人数达千人之众。征集史料之广、之多都达到了宏伟的程度。出版了许多许多出版物，有选编系列，有专题专集，足以武装专门的书店和图书馆。总之，有了队伍，有了成果，浩浩荡荡，成了气候，了不起。

其次，它造就一大批非常有可读性的出版物。正因为“文史资料”的王牌是“三亲”，便产生了独特的阅读效果。撰写回忆的人中许多是历史上知名的人士，他们的名字对许多读者来说是很具有吸引力的，这便是所谓“名人效应”吧。同样，被回忆的事也涉及许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知名人士，也是很能引起读者兴趣的。这便有了阅读价值和市场价值，而且天生铺垫了它的普及性。于是，“文史资料”几乎从诞生之日起就走进了广大读者的视野，而不光是在历史学家书斋中被收藏、被研究、被利用。应该说，它的利用率极广，既是史书，也是货真价实的高档次的大众读物。

再其次 名为“文史”实则“百科” 什么都有 从政治、经济、文化、艺术 到民俗、传记 五花八门 面面俱到 涵盖面、涉猎面极广 超过任何一类现存杂志 是跨门类的超级百科大杂志。每一册都有保留价值 可以上架成库备查。

这么个好东西，如果再精选一下，精益求精，岂不更妙。

于是，便有了《北京文史资料精华》。

我自己既是“文史资料”的老读者，近十五年又成了一名业余的“文史资料”工作者，自觉有资格说上面那些真诚的话。

它，有实，有味，有史，有趣，我爱它，也愿大家爱它。

目 录

庭训琐记——我与初创时期的故宫博物院	单士元(1)
清内阁大库档案流散记	单士元(22)
故宫明清文件档案流失的见闻	朱伟武(28)
记伦哲如先生	孙耀卿(32)
孙耀卿先生传略	雷梦水(37)
朱启钤收藏古籍文物二三事	萧新祺(51)
书林散叶	雷梦水(54)
北京图书馆变迁纪略	赵其康(65)
回忆一多师	范 宁(99)
和鲁迅先生来往的几点印象	金 丁(102)
鲁迅先生对我的教诲	李遇安(111)
未名社的始末	李霁野(115)
忆老舍与文协	于志恭(125)
章川岛先生事略	唐 沅(133)
忆父亲方白	晓青 晓钟(139)
记先父张我军的三件事	张光正(163)
张若名在北平	杨在道(170)
解放前夕的北平文化界	徐 盈(183)

忆恩师沈兼士	葛信益(190)
缅怀先父马衡	马文冲(197)
回忆嗣父熊十力	熊仲光(219)
忆父亲钱玄同	钱秉雄(225)
回忆父亲马寅初	马本寅(236)
我的祖父陆宗达	陆昕(247)
怀念史学家吕振羽	宇斧(261)
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柴德赓	俞履德(268)
契园老人和契园菊花	刘逢举(289)
“易万卷庐主人”卢松安	陈长慧(314)
古墨鉴藏家尹润生	张颖昭(325)
打油诗人张醉丐	傅耕野(333)
“北京通”金受申	傅耕野(341)
笔单	朱伟武(347)
回族爱国报人丁宝臣	丁文舟(356)
回忆《新潮》	俞平伯(360)
一代报人——邵飘萍	汤修慧(363)
记林白水	张次溪(389)
关于邵飘萍、林白水追悼会的回忆	林慰君(401)
目睹林白水就义	唐振宇(404)
杨刚二三事	赵萝蕤(405)
抗日战争前的《北京晚报》	季迺时(408)
记《北京女报》	姜纬堂(419)
平津报纸何以不登政整会成立新闻	季迺时(435)
《华北日报》停刊内幕	孙百里(437)

北京广播事业发展概述	赵玉明(439)
我国现代机械工程学的先驱刘仙洲	黎诣远(452)
张子高教授生平事略	安洪溪 孙敦恒(472)
记著名化学家曾昭抡教授	孙敦恒(486)
毕生致力于科教事业的庄前鼎教授	周撷清(499)
中国天文学会和北京古观象台	陈遵妣(514)
纪念北京天文馆建馆三十周年	李志安(537)
我与“北京人”头盖骨	陈志农(557)

庭训琐记^①

——我与初创时期的故宫博物院

单士元

一、青少年的求学生活

我是北京土著，世居京城近六百年。据父辈说，先祖曾在东交民巷经营人参店，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店铺与那里的衙署及府第等同被入侵者烧为灰烬，祖辈产业荡然无存；父伯一辈均以做小手艺为生。

1907年我生于北城。儿时读私塾，就是念“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一类的启蒙读物。私塾堂都离家不远，我印象较深的是地处地安门外帽局胡同的私塾堂。附近有个当年颇有名气的庆和堂饭庄。我现在还记得私塾先生姓曹，30年代时我们还在一起共过事。现在特别介绍一下，1912年我最早上的私塾堂，地点在地安门东，是原清朝太医院一个御医办的。

当年虽是辛亥革命后，由于溥仪仍在清宫内廷居住，太监、宫女及护军仍为小朝廷服务；处理皇家家族事宜的宗人府

本文系单士元先生平日与子女闲谈往事时的记录，由竹君整理而成。

衙门及太医院均未裁减。太医院还是照旧在此祭祀三皇（即伏羲、神农和黄帝）。还举行历代名医祀典，由太医院院判主祭，身穿蟒袍黻服，儿时父母曾携余观其仪。

这个私塾堂是由太医院陈佐领官（名陈守忠）办的。当年他已是长须老人了。校长名高紫垣，是涿州人。学校半官半私，学生只数十人。那时多数小孩是不上学堂的，我与兄弟及堂兄弟等人就读其中，是因二伯父当时在太医院看守房屋；我父亲也在宫内药库房当差；后来我们全家又住在太医院后群房内。如今八十多年前的旧照我仍保存着，太医院的旧状还印在我的脑海里。

太医院前为一大堂。大堂流云屏上悬清光绪晚年所颁布的《立宪誊黄》（清制，凡向全国颁发的诏书皆用黄纸誊写，称誊黄。辛亥革命前，清王朝衙门均悬此件），大堂内竖有“重建太医院记事碑”六方。大堂后有四合院及二堂，再其后为后罩房。其西向为三皇庙，大堂之左右有太医院佐领厅，西佐领厅南一小庙供奉有针灸血脉铜像，东佐领厅是土地庙。

民国初年，民国政府教育部经常派官员下来检查私塾是否教授民国新编教科书，称为查学或督学。所以我们那时都有两套课本，一套是私塾的，一套是教育部的。当时多数私塾先生不愿讲新教材，于是在查学的人一到，便马上叫学生从桌底掏出教育部的新课本，以示搪塞。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提倡办“平民夜校”，其宗旨是使一般贫民子弟亦可读书。1922年我十四五岁时便来到北大学生会在北大红楼办的平民学校学习。期间我半工半读，为维持生活白天曾在店铺作坊做工。如前门外小手工艺作坊和东四万历桥附近制做丸药的小店铺。后来我还经人介绍，抄写过《四库全书》。起因是，太平天国时，

浙江文澜阁的《四库全书》被残毁，为补齐之，以承德文津阁藏《四库全书》为蓝本，进行补抄。记得一天可挣一银元，时间大约是民国十二年（1923年）间。这个差事我当年自以为还是一件了不起的事。1924年夏秋，我通过考试升入北京大学史学系，是旁听生。这时我已是17岁的青年了。

辛亥革命虽废除了封建帝制，但溥仪及原皇室成员，仍居清宫后半部，并享有“大清皇帝”尊号，不用民国纪年；一批清朝遗老旧臣，仍然顶戴花翎身着黻服向溥仪跪拜称臣；大批太监、宫女、侍卫还在供封建小朝廷使用……这些举动，引起朝野人士及民众的不满，于是在1924年的11月5日，当年控制北京政局的冯玉祥将军发动了“北京政变”，将溥仪驱逐出宫。从此花翎顶戴、达官显宦出入宫禁的朝代便永远结束了。

溥仪出宫后，摄政内阁国务院发布命令，组织“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11月20日该会宣告成立。该会的主要成员均为政府各部院的高级官员和社会名流，北京大学教授、助教等也参与其间。当时我正在北大史学系听课，经有关教授的推荐，于是年12月27日进入善后委员会工作，1925年1月7日，被正式任命为缮写书记员。故宫博物院成立，我仍赓续在院。日前《中华英才》记者采访我曾有这样一句话：“溥仪出宫，单士元进宫。”从那时直至今日，我在故宫度过了70年的沧桑岁月。

二、在清室善后委员会

溥仪出宫之后，所有属于清内务府的机关随之解散，二伯父和父亲面临失业。于是父亲便托他的朋友周先生为我和我大哥士魁找个差事做。在周先生及他的朋友的帮助下，大哥便来

到善后委员会工作。当时我在北京大学史学系旁听课程。由于我对历史考古方面兴趣极大，教授亦希望我能在这方面继续深造，并指以从研究明清史入手。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后，北大史学系、文学院大部分学生、助教及著名教授均参与了善委会的工作。于是我在教授的提携下，也随老师们来到善委会，充当一名小助手。

我进入善委会时，只有18岁，没有高级学历，只能是充当低级职员，即做缮写书记员。即使这样，同样要有许多手续，不仅要有“人保”，还要有“铺保”。我的“人保”是当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许宝衡先生。我的“铺保”是地安门外的小银号张掌柜。这位张掌柜原是打地摊换钱的个体小户，是从兑换零整钱中赚钱起家的。如一个银元应换五十吊铜钱，他只给四十六七吊；反之五十余吊铜钱才能从他那里折成一银元，时间长了就赚了钱开了银号。因我二伯父与他很熟，所以他才肯担保。当年，找个铺保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有钱人家都不愿承担责任。有了人保和铺保，再在已先从善委会领取的类似合同书的凭证上签字盖章，然后交回，方才生效。我和长兄都履行了这样的手续，才算正式进入善委会工作。

清室善后委员会的职责是办理清宫公私财产及一切善后事宜。它是公开于国民的组织机构。委员长是由国务院任命的李煜瀛教授。李先生字石曾，为清代同治、光绪两朝老师李鸿藻之子。曾留学法国并参与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之事。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是一位思想开明人士。善委会同时聘请蔡元培、陈垣、沈兼士、俞同奎等十位名流学者教授担任委员。在政府国务院下的各部均派官员协助参与点查清理工作（称助理员）。我记得教育部入选中，就有鲁迅先生。同时还聘请社会知名人士庄蕴宽等为监察员。又聘顾问多人，其中有胡适教授。另

外，清室遗老宝熙、罗振玉等五人为清室代表亦在其中。在具体工作人员中有事务员、缮写书记员。当年的书记员现在世的，还有供职台湾省故宫博物院的我的老同事那志良先生。

善委会成立一个月后，即在12月20日决议出了“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清宫物件规则”。这个规则对清查从登记到物件挪动及工作人员运作规范等都有相当严密的规定。现在我还清楚记得几条，如规则中第二条，“点查时分组，每组分为执行及监视二部，其职务之分配临时定之”。第六、七两条，“每组人员排定后，于进内执务前，均须在办公处签名，并须佩戴徽章”；“登录时，每种物品上均须粘贴委员会特制之标签，一面登记物品之名称及件数，凡贵重物品并须详志其特异处，于必要时或用摄影术或用显微镜观察法或其他严密之方法以防抵换”。第八条，“点查物品时，以不离物品原摆设之地位为原则，如必不得已须挪动地位者，点查毕即须归还原处，无论如何不得移至所在室之门外”。第九条，“室内工作时，得视必要情形，更将组员分为小组，以免拥挤”。第十条，“室内工作时，不得单独游憩，不得先进或后退”。第十一条，“室内工作时，监视人员须分立于执行事务人员之间，不得自由来往于事务地之外”。第十二条，“室内工作时不得吸烟”。第十三条，“组员有违背规则时，监视人员得报告于委员长及监察员处理之”。第十六条，“各组进屋勤务，无论已毕未毕，出屋时每次必须加以封锁，由本组会同军警签字，或作别种符号于上。点查未完之箱柜亦照此办理”。在第十七条中规定“本会每日应将点查情形编出报告公布之”。当年点查之日，紫禁城门有冯玉祥部队及北京警察厅士兵守卫。工作人员均须佩戴清室善后委员会证章并经过检查方能通过。

记得我到善委会的当日，有教授对我说：“溥仪在辛亥革

命退位后，曾于民国六年复辟，企图推翻民国。事未得逞，仅历数日，昙花一现。但其再度复辟之心未死，一些保皇党遗老之流，日日为溥仪谋之。让溥仪出宫，是完成辛亥革命未竟之业，意义重大。”我为青年后生，听后颇为兴奋，参加清宫旧藏文物的点查工作，还属革命之业，得以为荣。

溥仪出宫后，原清室内务府当差者和随溥仪出宫的人生活随之拮据；清室遗老更为溥仪出宫愤愤不平，并为此奔走呼号。他们都迁怒于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所以我们在街上行走，时时遭到一些人的白眼。故此我在前往紫禁城途中，不敢将证章外露而掩于衣襟中。记得一天，我前往紫禁城，有两位老者（大概是上述遗老）便指我怒视对曰：“这男孩子参加革命党了！”这是轻的，重则拳脚相加。

清室善后委员会内，几位前清遗老亦采取不合作的对抗态度。1924年除夕之日，孙中山先生北上来京，遗老们以驱逐溥仪出宫时，孙中山不在国内为由，借机联手向孙中山先生致书，说清室移宫违背了民国初年所订的优待条件，请孙中山出来“主持公道”等等。时孙中山先生正卧病北京，即由秘书处复函清室，指出溥仪不履行原定的优待条件中之种种做法：不迁居颐和园；不通行民国纪年，仍用宣统年号；不废止对官民赐谥及其他荣典；民国六年又有复辟帝制之举……这些都是对优待条件完全毁弃之行动。在孙中山先生正义严词之下，清室则无言以解，更无狡辩之余地。不幸的是，中山先生不久因病逝世。

旧中国军阀混战，政局动荡不安，使善委会工作如雪上加霜。尤其是清室代表与段祺瑞执政府联合起来对付清室善委会，更给清理点查工作带来困难。先是清室代表五人，均表示拒绝参加清理点查，同时还连续将善委会信函退回。1924年

12月底，他们又向内务府发出一函，反称善委会点查工作“纯属片面行为”等等。同时还造谣中伤善委会主要成员。面对这样恶毒攻击和无理取闹，善委会的领导成员都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不久，段祺瑞政府秘书厅竟指示内务部下令致函清室善后委员会，曰：

径启者：奉执政谕，据报清室善后委员会于本月二十三日点查清官物件。现清室善后之事，政府正在筹议办法，该委员会未便遽行点查。着内务部暨警卫司令查止等因，相应函达。贵部希即查照办理可也。此致 内务部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善委会见形势不利，采取果断行动，立即召开会议。取得一致意见后，将决议函复致段政府：

……点查清宫物件，系会内应有手续。又本会点查规则，系会同军警各机关及各项专门学术人员分组办理……似非单纯行政机关可比，万难中止。

同时乃按原计划，按制度逐日进行点查工作。点查中严格实施了清理公产、私产的原则。如在溥仪的行李出神武门之际，军警及察监人员检查时，发现行李中有属于国有的传世之名字画，于是当场予以扣留。后来清室人员又借口溥仪的冬衣不足，以取冬衣为名，连哄带抢提出上百件皮货、首饰等，其中私藏了乾隆年间瓷器及其他贵重物品。如此等等，都被扣了下来。月余后，1925年3月，善委会在毓庆宫点查物品时，发现了一本糙账，记录了诸位大人借去的字画古玩等。7月在

养心殿溥仪原居住处，又发现密谋复辟的文件（故宫当年即印出题为《甲子复辟文证》的小册子）。足以说明溥仪在小朝廷时期，除吃喝玩乐无度挥霍之外，还以赏赐或借出等各种名义将宫中传世之宝移至宫外，窃为己有。当年查出共有宋、元、明版书籍二百余种，唐、宋、元、明、清书画上千余件。以赏溥杰名义拿走古画就有一千多件，皆属琳琅秘籍缥緗精品。

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均有收藏文物之传统。一个王朝灭亡后，新的王朝则取其收藏为本朝所有；清之于明亦循其例。所以清宫中历代宫廷传世之宝，均应视为国家所有。善委会一方面积极点查文物，把这些本应属于国家的珍宝收为国有，另一方面积极筹备，创造条件，尽快将它们公开于国民，让人们了解那神秘的封建皇宫以及皇宫中所藏历代文物国宝。

我到善委会后正式参加点查文物是1925年1月，此前的一两次点查，我因手续未办妥未能参加。如此之大的紫禁皇宫，对于参加点查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极为新鲜。对我来说，至今虽然已是70年前的事了，但回忆起这一段经历，仍然记忆犹新，仿佛昨日。

70年前的故宫可与现在不同。当时能进故宫的人员，只有善委会的成员和搬扛物品的工人，及北京警察厅的保卫人员。1925年一二月份，点查清理工作开始不久，正值隆冬季节，似乎当年也比现在冬季冷得多，有时到零下18℃。一进神武门洞，西北风打得你身不由己地往宫门洞两壁撞，几乎无法行走。可以说常常是打着转儿进故宫。我心里默语“老子青牛”，因牛善逆风，就这样来鼓励自己战胜严寒。那时我家住在鼓楼北面的前坑胡同。每天我步行到神武门。当年清宫北门即神武门，不像现在这样宽敞，还有一道门叫北上门。在北上门的东西两侧有东西连房。房前各有一道墙向东西伸延至与景

山东西墙平行，用牌楼连起来，就是现景山东街拐弯处和大三元酒家址。那时从神武门是看不见景山门的。北上门顾名思义是北去的门，是故宫对景山而言。在东西连房后还有一条路可以通往神武门。当年我每天就是经过这条路进入故宫的。

初入清宫，其凄凉景象跃然入目。每到一个院落都是蓬蒿满地，高与人齐。于是在点查工作开始之前，要有人手持铁镐、镰刀为参加点查的各政府官员和大学教授学者开路。隆冬时节，北风凛冽，出气如霜，唇际浮冰。进入冷宫更是寒气袭人。在冷宫点查，两足站地，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脚时常冻得痛若刀刺。我为缮写书记员，实为编号粘贴之役，双手常常冰冷僵直木然。身着无口袋的特制工作服，还以白带系紧袖口，使得双手无处可藏，此举为预防发生偷盗之事。点查中各部助理员虽着宽袍大袖之服，亦受登高站立之军警监视。

清宫内各个殿堂，真可谓冷宫空旷，任其荒芜。有的库房前门封锁，后墙则已坍塌，成为狐鼠出没之所。

我用几乎冻得僵直的手，提着一个带有四框的木制小盒，里面放有签号、糨糊、纸笔等物，为点查者备用。比如，某一宫殿里有玉寿桃一个，是这座殿中第三件被点查的物品，点查者按顺序报三号，并报该物名称，于是我马上用笔在签上写上号数，或挂或贴在该玉寿桃上。点查各宫殿的顺序是以旧时小孩启蒙课本《千字文》的内容为序。如“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天、地、玄、黄”代表四个宫殿，然后以此类推。因第一个点查的是乾清宫，因此乾清宫以“天”字记录在点查报告上。至于乾清宫内其他各室，则按其他顺序号来编排。

点查清宫茶库时，还看到积存的大批茶叶，有云南、安徽等各省名茶，均属贡品，并装在特制的有龙纹海水江崖或双龙戏珠等图案的锡筒及银筒内。其中云南普洱茶膏亮如小型墨